农民工随迁子女初中后教育选择研究

王刘飞, 王毅杰

(河海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南京 211100)

摘要:基于对南京市一所接收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公办学校的调查,发现随迁子女对自身未来的预期较低,他们大部分最终进入职校继续读书,读高中的比例非常少。这种教育选择是一个多方主体共同建构的结果:首先,国家的“双轨制”赋予了职校与高中不同的寓意;其次,由于随迁子女家长在经济资源和知识库存上的缺乏,使得他们即使对孩子有较高的教育期望,却无法转化为有效的督促和帮助;第三,教育部门仅关注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入学问题而非升学问题,在学校教育过程中采取“区别教育”(即集中于他们随迁子女的身份)而非“融合教育”。这些机制共同作用于随迁子女,使他们最终选择职校,而他们自身也会主动地合理化这种选择。因此,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成就低预期的问题,不能仅仅着眼于个人“自我选择”,更应该从制度层面思考“结构选择”。

关键词:随迁子女;教育选择;双轨制;农民工子女;教育公平

中图分类号:G639.2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17)05-0110-08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17.05.015

一、引言

1990年代中叶以来,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关心的热点问题。为促进流动儿童在流入地公平接受教育,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从2001年的“两为主”(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到2014年的“两纳入”(将常住人口纳入区域教育发展规划,将随迁子女教育纳入财政保障范围),彰显了中央政府对做好流动儿童义务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视。虽然随迁子女拥有了进入公办学校就读的制度性机会,但在地方政府欲纳还拒的管控心态和体制框架下,他们还是难以享有较高教育质量,获得接受更高层教育的机会^[1]。同时,更多地是由城市薄弱学校来接纳他们,这些学校多位于城乡接合部,其本身便存在着本地生源不足的问题,因而主动接收或者被地方教育部门安排接收随迁子女^[2]。这样的制度与社会环境,不仅影响着随迁子女在城市就学的状况^[3],更影响着他们的教育结果。

在中国,中考是第一次分流,是义务教育向非义务教育的转折点,也是学生第一次面临多元化的教育选择。对于初三学生而言,选择继续读高中还是读职校,或者直接参加工作,这是人生轨迹的重要分水岭。对于随迁子女而言,他们还多了条选择:回家乡,还是继续留在城市。2007年,杨东平、王旗在北京调查发现,有41%的学生希望回家读高中,36%的学生打算在北京读职校,但实际流向与意愿严重不符,只有5%—10%的学生回家读高中,10%—20%的学生在北京读职校,其余的都留在城市直接走上社会^[4]。宋映泉等对北京市1886名流动儿童的长期追踪(2010—2015)发现,在初三毕业之际只有39.31%的学生升入高中(普高和职高的比例分别为12.96%与26.35%),而随着年级的升高,学生在校的百分比逐年下降,到高三毕业之际在校的比例仅为11.72%(普高5.89%、职高5.83%)^[5]。

在随迁子女人群中,普遍存在着教育成就低的现象。但是,这种义务教育阶段之后的教育选择

收稿日期:2017-04-17

本刊网址·在线期刊: <http://jks.jhun.edu.cn/jhxs>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不同社会群体间社会距离及其弥合机制研究”(15CSH006);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公平及保障机制研究”(2016SJB840011)

作者简介:王刘飞,女,安徽岳西人,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王毅杰,男,山西万荣人,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这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同时,教育选择虽然是通过“中考”这个时点的成绩来凸显,但它却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因此,本文将讨论随迁子女教育场域中不同影响主体的行动逻辑,分析这些主体是如何作用而造成这一结果的。

二、教育选择:结构选择与自我选择

什么是教育选择?它是社会选择在教育领域中的一种争斗,其目的是为了获得更高的教育水平以借此获得更好的生活机会。换句话说,教育选择是通过教育场域中各种社会争斗来使优胜者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与机会,并通过教育利益的转换取得更高社会地位的过程^[6]。

关于教育选择,早期学者特纳(Ralph Turner)在比较分析英美两国教育制度时,曾提出过赞助性流动与竞争性流动这两种精英选择模式^[7]。这两种模式相对应的是不同选择标准的区分:社会选择与技术选择。社会选择是根据优势阶层的偏好而实行的一种评价筛选机制,包括身份、种族、阶层地位等;而技术选择则是根据人们的智力水平、努力程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能力差异而进行的选择,更多偏向于将考试、测评作为筛选手段。

特纳主要是从不同社会结构入手来分析教育选择的,那在同一个社会结构中,各阶层又是如何争取教育资源呢?为此,鲍厄斯(Bowles)和金蒂斯(Gintis)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教育选择与各阶层之间存在一定的符应关系,通过考察美国资本主义学校的教育体制,发现不同阶级接受不同课程内容与价值观,训练不同的阶级认同,进而进入不同的工作岗位与社会位置^[8]。布迪厄(Bourdieu)也将“选择”纳入其教育社会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在布迪厄的分析中,教育是一种“选择”和“自我选择”的过程^[9]。他认为,由于学校传递的是一种上层阶级精英文化,因而上层阶级子女可以轻而易举通过选拔,而受支配阶级子女更多沦为落伍者。这种“选择”并非偶发,而是具有累积性,且贯穿于整个学习阶段,会潜移默化地被身体化并形成某种稳定的“惯习”,进而制约行动者的选择。教育选择实际上成为再生产不平等社会结构的重要机制,同时这种教育选择的结果也使得个体会主动放弃向上流动的机会,即使存在“洞察”,但殊途同归^[10]。

中国教育有着自己的特殊性,教育体制异于英和美国,但是国家制度与社会结构同样会影响到个

体的教育选择结果,即教育选择是由“结构选择”与“自我选择”共同形塑而成的。目前国内对于随迁子女初中毕业之际教育选择议题的研究,更多是从量化角度探讨其影响因素,其中包括个体特征、家庭背景与学校类型^[11]、个人能力与文化图示^[12]等,这种取向相对忽略了行动者对情境的建构过程,即随迁子女对自我选择时的情境理解。同时,教育选择并非时点的决策,因而需要对不同主体的选择做出深刻而丰富的描述才能理解其选择背后的“意义脉络”。因此,本文从质性研究角度分析宏观国家制度、中观的社会阶层与学校场域如何影响随迁子女的教育选择,以及各自的影响机制是怎样的?同时,随迁子女教育选择结果又将呈现何种特点,会不会通过考试等技术选择突破社会阶层再生产?随迁子女本身又是如何看待这种结果的?

本文经验资料来源于笔者与课题组另两名成员在南京X中学收集到的第一手资料。X中学始建于1965年,2004年被区教育局指定为招收外来农民工子女的唯一一所公办学校,随迁子女比例达到90%以上。该校处于城乡接合部,所在的周边地区多为农民工聚集区,大部分住户来自于河南、安徽,从事个体经营(小商贩、废品回收、运输等)。2012年9月至2014年7月,三名课题组成员在该校进行了约两年时间的田野调查。在此期间,我们以实习老师的身份进入初三班级,每周随堂听课半天,并参加班会及课外活动等。随着与学生关系的建立,我们的观察也延伸到校外,如一起爬山、QQ聊天、带他们来大学校园参观等。同时,笔者还访谈了负责教学的校领导、年级主任、班主任和部分授课教师。在初三毕业之前,笔者还对2013届初三年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研,有效问卷资料是110份。

三、随迁子女教育选择现状

我们所调查的2013届初三年级总共121人,其中男生占61.9%,女生占38.1%;南京本地学生仅仅11人,其余均是农民工随迁子女,其中绝大多数来自于安徽、四川、江苏、河南四个省份。表1显示了随迁子女在初一、初三两个时点上对初中毕业后的想法。

可以看出,与初一刚来学校时相比,初三之际的随迁子女期望“考高中”的比例下降了约30%,而对职校的选择则相应提高了。为什么年级越高,对

考高中的意愿却在降低呢?其原因是对于知识重要性的不看好,还是基于对升学与成功的低预期?

表 1 随迁子女在不同阶段的初中毕业打算(N=110)

	初一时	初三时
1.考高中	62(55.9%)	29(26.4%)
2.职高或者技校	35(31.4%)	69(62.7%)
3.早点工作	5(5.1%)	8(7.3%)
4.没什么想法	8(7.6%)	4(3.6%)
合计	(100%)	(100%)

当我们询问他们关于毕业之后打算时,普遍的回答是:

至于什么高中要看自己考了多少分,哪个够就去哪个,要考的不好就去读个职高,也不知道是哪个,我觉得不是我选学校而是学校选我的问题。(20131216)

“被学校选”这个词汇涵盖了他们的诸多无奈。那么,他们认同“读书无用”吗?在问卷中,询问了他们对于“一个人成功的因素”的看法,34.7%的人认为“勤奋努力拼搏”最重要;其次是“受过良好的教育”,占20.7%;第三是有“比较广的社会关系”,占17.5%;“天资聪明和能力强”占12.7%。可以看出,在初三这个阶段,大家还是很认可自致因素,觉得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获得成功,但获得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并非是通往成功的“唯一”道路。

在一次月考之后,笔者和E同学聊天谈到“读书有用与无用”,他很干脆地回答笔者“读书无用”。笔者追问原因,他说:

不管读不读书以后都是为了生存,不继续往上读我照样可以挣钱。上大学的步入社会后都是给别人打工的,挣钱少;而学习不好的是自己当老板,赚钱多。爷爷不让伯父上大学而是让他做生意,现在过得好好啊。(20130408)

虽然“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但是也仅仅停留在“可以”上,而非“唯一”。除此之外,年级越高,学生们对自己的成绩认识与定位也更加清晰,同时也更能感受到制度性瓶颈,毕竟在他们中考前夕,异地高考政策才刚刚出台,升学的政策障碍仍是影响他们做决定的重要因素。那么,在随迁子女教育场域中,有哪些机制影响着他们的这种选择呢?

四、随迁子女教育选择的作用机制

随迁子女的教育选择包含着不同主体的共同交互作用,具体有国家制度选择、家庭物质性与非

物质性的影响、学校选择、周围同辈群体的作用等。

(一)国家制度选择:双轨制

国家作为随迁子女教育选择的影响主体之一,其作用机制是双轨制。教育分轨制(tacking)与国家的发展策略密切相关,它是一种由国家利益所决定的制度安排。正是通过这种制度安排,不同的个体被选进不同的教育学制轨道,接受不同的教育,最终流向不同的工作岗位。从某种程度来说,教育可以被看作是“国家发展主义”的重要机制之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百废待兴,培养技术人才成为当时国家重要政治任务之一。在此背景下,国家与企业并举办学使得中等专业技术教育得到迅速发展,职校招生规模也逐渐扩大,职校生不仅工作包分配,还能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虽然到“文革”期间有停滞,但在国家对职校进行深化改革之前,职业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随着国企的改革,到1999年,职业教育的计划培养、包分配让位于市场化运作,企业办职校也转为当地政府办职校。企业用工也不再是传统地从工厂内部培养,而是从市场直接招工,市场化的契约关系代替了“铁饭碗”。同时期的大学扩张也使得普通高中的入学率远远高于职业学校,普通高中日益成为进入大学的必备阶段。第三,独生子女政策使得新生代城镇职工对就业环境发生观念改变,对工作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工作环境艰苦的一线工人岗位也不再是大家的首选^[13]。这样使职业教育不再成为城镇职工子女进入工厂就业的重要途径,相反,还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

而作为与职业教育分轨的“普通高中”,在“文革”期间,受平均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双轨制”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路线,职业学校大量划归到普通高中。到1978年,普通高中在校人数比达到92.4%,远远超过职校。改革开放之后,高中教育的重点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其中有两政策主线:重点高中制度与规模扩张,即提高与普及并行。其中,重点高中意味着通过严格的考试选拔将成绩优异者集中培养,朝国家预备精英发展,它作为普通高中的示范“窗口”,受到国家各种优先发展扶持政策的支持。1980年代中期,随着《义务教育法》颁布,对扩大普通高中规模也提出了迫切要求,高中至此走上了规模扩张的道路。与1995年相比,2001年普通高中招生数和在校生人数都实现了翻番。

在“双轨制”背景下,职业教育与高中教育都在

不断扩张。21世纪以来,国家还是尽力维持两者在人数比例上的平衡,结果之一就是并非所有学生都能进入普通高中。同时,随着重点高中政策的推广与职业教育面向市场化,教育体制中的“两轨”差异在不断扩大。正是由于“双轨制”的存在,给予了职校与高中不同的寓意,即使两类学校类型与特色不同,也并不存在高低之分。但现实中高中被当作进入大学的预备阶段,成为“地位取向”,能满足身份阶层地位的向上流动;而职校成为一种“二流教育”,仅仅是“生存取向”,满足基本生计。

(二)家庭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

随迁子女教育场域中重要的、不可缺少的是家庭影响。不同阶层家庭的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均会影响孩子的教育分流。其中,家庭经济背景的优势并非直接转化为中考成绩,而是通过各种投资直接与间接影响子女的学业成就^[14]。吴愈晓基于CGSS2008数据,也发现重点学校制度以及学术/职业教育的双轨制维持了教育不平等,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学生更有可能进入重点学校或学术轨道。此外,这种不平等还具有累积优势^[15]。这样,家庭背景会通过教育分流实现优势地位的代际传递。

农民工家庭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家庭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匮乏已是不争的事实。在所调查的110名学生中,有4名是单亲家庭;父母都住在南京的只有65.9%。父亲与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在“初中及以下”的分别占85.6%和83.1%。在职业上,绝大多数随迁子女父母仍然从事着技术含量不高、工作时间较长、收入低的工作,个体经营户、小生意者以及基层体力劳动者比较多。他们认为家里经济状况“一般”的占66.9%，“不好的”占到33.1%。在住房上,有个别家庭能通过多年积累在南京购房,但大多随迁子女家庭住在城郊或城中村,有的甚至还是隔板房,学习环境非常有限。在笔者家访的时候,发现大部分学生没有专属小书桌,一般以饭桌与床代之。父母对于子女的学习也是有心无力,仅仅“询问成绩”的有50.2%，“买课外辅导书”的有14.8%，“和老师沟通交流”的有12.3%，“辅导作业”和“请家教”分别有5.9%和5.4%。在随迁子女父母看来,孩子犯错误老师才会找家长,不沟通代表孩子在学校表现良好。同时受制于经济资本的限制以及缺乏挑选、辨别课外书的能力,使得口头询问成绩不仅成为一种便捷的方式,也是一种别无他法的

选择。

虽然物质性因素制约着学生的成绩,但非物质因素更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其中不得不提及父母的教育期望,这种期望具有强有力的、自证预言的效应^[16]。在学生看来,父母希望“自己读的越高越好”占58.5%，“随便,能读到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占28.0%，“希望“早点工作”的有0.8%。一般来说,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尽量读,“只要能读,砸锅卖铁都给上”的话语更是不绝于耳,可见他们对孩子也是有期望的,只是没有具体的目标设定,或者说这更多是属于一种“抽象态度”,而非“具体态度”^[17]。这种期望更多地是以一种口头方式呈现出来,就如“你是爸的希望,你是妈的希望,我们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不能让希望变成失望”;“现在家里就你是最让人担心的,也只能指望你了,希望你好好读书,家里靠你”;有的甚至在墙上写着标语“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以此来激励自己的孩子。但是这种期望与父母在现实中的行为存在着较大的反差。

以家长会为例,初三一学年两学期共开了5次家长会,每次每个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家长不来参加,班主任李老师告诉笔者:

家长们把学校当做托儿所了,只负责将孩子送来,平时从来不会主动和我们沟通孩子学习情况,可以说大部分都不怎么配合学校教育,你说有时候能不生气吗?但是每次家访看着家长们起早摸黑忙,又觉得心疼,他们也是的确是有心无力。(20130414)

当问及一位学生“父母对自己学习情况是否了解”时,他说:

爸妈不理解啊,以为我们在学校里就知道玩,他们说上课有什么累的?就坐在位子上,老师讲,你们听着,回去就让我看书,看书,其他的啥也不问……(20130321)

可见,家长对于孩子学习情况所掌握的信息较少,与老师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更重要的是家长对学习的认识也仅仅停留在“送孩子上学”“认真听课”这些情景,也不知道如何与孩子、老师进行交流。除了笔者的田野调查,熊易寒^[18]的研究也有类似发现,农民工父母的这种期望与现实行动并不一致。

那么如何理解这一现象呢?除了经济因素之外,Swilder还从文化角度(文化指的是行动者可以调用的知识库存,它是认识与经验的储存室)做出解释。他认为,关注底层群体是否共享主流价值观

是没有意义的,底层阶级会说他们重视教育,希望能够上大学,但他们的文化储存却以与中产阶级完全不同的方式指导着他们的行为,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他们的知识库存中并不具备实现这一志向的储备,因而不知道如何达成这一目标^[19]。在农民工家庭中,生活压力已占据他们大部分时间,因而缺少精力去了解、学习相关“教导孩子学习”的经验,也就无法积累相关知识。

(三)学校理念与实践

虽然家庭经济与文化资本很重要,但是随着入学阶段的提升,即在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升学过程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文化背景的影响可能逐渐被学校的位置所取代^[20]。那么,X中学实行怎样的教育理念与实践呢?

X中学从被指定为接收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公办学校后,逐渐形成以“融合教育”为理念,以“勤”为校训,以“成长在X,成人在X,成才在X”为教育策略。以“做一名昂首挺胸的南京人”为办学目标,并将上述内容制作成标语张贴在学校教学楼显眼的墙壁上,同时,“做一名昂首挺胸的南京人”更是被印在学生校服的背面。对此,作为校方负责人的M校长诠释道:

这些孩子都是农民的孩子,家里没有钱没有背景,因此唯一的出路只有一个字——勤!它包含着督促领导要勤政,老师要勤教,学生要勤学。他们当中很多进城了都没有打算回农村,希望能留下。但学习基础都很差,家庭经济状况又不好,谈何留下?倘若好好学习,将来有了好工作,再买了房子,他们不就留在南京了吗,我们学校就是让他们能够成才在南京,成功在南京。(20130302)

鉴于此,校长将“随迁子女成为地地道道的南京人”提升为X中学教育指导方针。在X中学,校长与老师一致认为:

随迁子女与本地孩子相比,在心理、行为举止和学习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他们的父母忙于生计,和孩子的沟通交流少,孩子得不到足够的情感支持,容易产生孤独感;同时,随迁子女的文明程度与城市出生的孩子也存有一定差距。(20130417)

基于此,如何大力改善学生的学习习惯与生活习惯便成为重中之重,尤其是生活习性,如饮食卫生、个人卫生、礼仪规范,需要从外在表现上使其符合地道南京人的标准。

而对于学习,在“融合教育”理念下,学校更多地是强调接收随迁子女以及对社会的影响,关注点

集中在解决随迁子女的入学问题而非升学问题。毕竟在全国各大城市均面临着随迁子女教育问题时,X中学这种积极吸纳的举动,一方面能获得极高的社会道义,另一方面也使得政府的治理成本大大减少。以此,区教育局也会做出一定的“反馈”,即对升学指标不进行硬性规定,原因之一是在此时期随迁子女中考、高考政策并不明朗,因而城市公办学校接纳可能仅仅是个过渡,随迁子女还得回户籍地参加中考与高考。原因之二是基层政府和教育部门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解决大规模进城的随迁子女入学问题,保证他们有学可上,使他们不至于在城市“游荡”,对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构成威胁。原因之三是随迁子女进入城市,被当作基础参差不齐、阅历见识少的“乡下儿童”,因此不能用城里升学标准待之,首要关注的是他们能否适应城市的学习和生活。如此一来,区教育局不仅给予专项财政补贴和奖励,在绩效考核中,也额外加分,毕竟X中学节省了基层政府和教育部门的治理成本。因此X中学升学率实际上是处于保底而非高压状态,正如教务处一名老师所言:

虽然每次都是区倒数一名,但是不能和倒数第二名相差太远。(20121104)

当相差太大时,就会撤销一位班主任职务以示惩罚。在如此的教学要求下,无论是在教学内容还是方式上,均呈现出“低起点、低标准”的特点。

当农民工子女涌入城市,当随迁子女教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之后,X中学作为唯一一所区指定接纳的公办学校,在2006年通过创造“融合教育”,开启了随迁子女教育的有益尝试,且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赞同与肯定。但与此同时,因学校的相当活动均围绕“随迁子女”身份这一特殊性展开,这就使得这一阶段的“融合教育”本质上更像是“区别教育”,将随迁子女与本地学生相区别,将接收随迁子女的公办学校与一般普通公办学校相区别。

在这些机制的影响之下,随迁子女教育选择的结果如何呢?同时他们自身,又是如何看待这种结果呢?

五、教育选择的结果

从严格意义上讲,教育分流始于初中毕业,这是由于政策规定义务教育阶段是划片区就近入学,而只有初中后的教育是依据学生此前所取得的学业成就作为筛选标准。因此,中考作为一种考试制

度,需要通过成绩作为最终衡量的标准,考试成绩的高与低,与参与考试的个体的思维能力、掌握相关知识的熟练程度、临场发挥时的心理状态密切相关,这些需要个体在考试时点上单独凸显出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每个参与考试的行动者而言,考试至少在形式上是平等的。表2是X中学2013届学生最后的中考成绩。可以看出,X中学中考成绩并不理想:2013年南京市普通高中中考录取分数线560分,X中学达线的仅仅14人。

表2 X中学2013届学生中考成绩分布

分数区间	频数(频率)	分数区间	频数(频率)
290-300分	2(1.7%)	451-500分	26(21.7%)
301-350分	10(8.3%)	501-550分	22(18.3%)
351-400分	21(17.5%)	551-600分	10(8.4%)
401-450分	25(20.8%)	601-610分	4(3.3%)

注:总人数120人;满分740分,最高分610分,最低分290分;均值454.02分,标准差78.46。

除了中考统招生,南京市还有一项指标生的规定,它是将四星级普通高中^①招生计划按照一定的比例定向分配给初中学校。其对象面向南京市所有初三应届考生,条件是需要在学籍所在初中学校实际就读满三年;除此之外,指标生报考还需要达到一定的分数线,即不得低于全市中考成绩排名前30%考生的最低分,然后根据各初中校(或全区)的指标数和考生所填志愿,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X中学每年也有分配名额,但由于学生成绩普遍分布在400—550分之间,很难达到前30%的最低分,因此名额常常出现作废的情况。班主任也曾告诉笔者,实际上指标生分数线与四星级高中分数线差不多,因此可想而知,指标生价值的发挥在X中学是非常有限的。

而在最后流向上,2013届初三毕业生66.6%最终去了职校,上高中的仅仅占11.6%(其中五星级8.3%,四星级3.3%),17.6%的学生则选择直接就业。与表1的意愿相比,可以发现,就读职校的比例很接近,但实际读高中的人数比意愿的明显偏少,而直接进入工作岗位的比例却提高了。同时,就读职校的比例不管是意愿上还是最终结果上都是最高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并没有直接走上社会复制父辈的生活轨迹。那么,他们又是如何看待这种结果呢?

当笔者聊到上高中意愿时,I同学表示:

上高中多累啊,我看那些上高中的同学,有的住在

我家旁边,天天生活得真累,还住校。

J同学认为:

一般普通高中真不好,在学校就是混,上不上没有什么差别,浪费时间浪费金钱,还有我的青春。

K同学:

三年高中太长,还要面临高考,压力多大啊。(20130518)

在这里,随迁子女会通过转换比较维度,用高中的生活苦、生活累而非高中能带来上大学的入场券来凸显不上高中是一件非常舒服的事情,不上高中既能充分利用时间,也能享受青春。

除了转换高中的比较维度,大家还会用未来生活来评价当前处境,“退一步”为不上高中找到合理的解释,如H同学:

上个普通高中还不如学一门技术呢,有一技之长比上大学还好,我想学个厨师。我姐是大学生,也是个好大学,学美术专业的,也没什么用,现在不就是做做销售嘛。(20130518)

只要都能过上好的生活,具体是什么途径并无差异。通过直接做生意或者去学一门技术等方法来淡化考高中上大学这条道路的影响力,这就为选择“不上高中”的行为披上了一层合理化的外衣,从而也获得巨大的心理满足感。

对于职高,很多学生的认识是“要考的不好就去职校”,具体什么职校、什么专业、自己的兴趣爱好却全然不知,也没有仔细思考过,对职校处于一种“茫然无措”的状态^[21]。在填志愿的时候,要么遵循老师的建议,要么跟随同辈群体。对此,老师解释:

那有什么办法呢,我是希望他们找个能学到点技术的专业,这样找工作就比那些什么技术都没有的普工好一点,也只能这样了。(20130621)

对于好学生,老师希望可以冲一冲指标生;对于其他学生,则希望男孩子学工程技术、维修等有点技术的专业,女孩子就学点会计、服装设计之类的专业,这样找工作相对有点优势,更多的是从性别与就业的角度去出发。而对于学生本身而言,也正是按照这种逻辑来填自己的志愿,并不知职业学校对于自己的人生意义^[22]。

六、结论与思考

自古以来,不管是科举考试还是现在的中考、高考等,考试均发挥着重要的筛选功能。作为重要的技术选择,虽然是时点性的,但却是持续积累的

结果,同时也是多方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

本文以 X 中学 2013 届初三年级学生为田野观察对象,分析了随迁子女初中毕业分流的意愿与分流结果,发现与“刚入学”相比,初三之际随迁子女选择进入职校的比例升高,占三分之二,且实际流向与此比例相当。而选择上高中的比例,不仅随着年级的升高呈下降趋势,且实际流向的比例大大低于意愿比例。随迁子女这种教育选择与分流结果受到多重机制影响。

首先,国家层面的“双轨制”。作为一种教育分化体制,将高中阶段划分为普通高中与职业教育,两者均体现了国家利益制度安排,重点高中制度以及职业教育的市场化又使得两者差距在不断扩大,普通高中成为接受高等教育的前期准备,而职业教育成为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前期准备。其次,家庭层面的物质因素与非物质因素。农民工家庭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均处于弱势地位,具体表现为:父母文化水平较低、多从事低端不稳定职业、对子女时间及精力上投入均较少。虽然有较高的教育期望,但更多是抽象而非具体化的,且囿于相关知识储备,难以将这种期望转化为实际行动。第三,学校教育在社会分层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却也一直存在着两种争议:一是认为教育能帮助个体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相反观点则认为学校是阶层再生产的场所。对于随迁子女来说,“两为主”的政策的确赋予了其所在城市给予机会均等的竞争机会,但是他们更多地被安排进入的是薄弱公办学校,教育部门的关注重点也在解决他们“有学上”而非“升学”问题,在此场域中的学校领导与老师工作的重心也是如何从外表与行动上让他们更符合城里人的生活习惯。

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随迁子女大部分流入了职校,上高中者屈指可数。虽然有看似公平的考试制度存在,但考试的技术选择并未让随迁子女突破阶层再生产的漩涡。可见,“两为主”下的“同城待遇”并不会带来乐观的教育结果,上高中仍是他们一道不可翻越的围墙。如何提高他们的学业成就感以及在毕业之际引导他们做出合理的选择,是当下不同主体需要面对与共同解决的问题。在笔者看来,解决之道不能着眼于个人和家庭的“自我选择”上,而是需要从制度层面上思考“结构选择”。

首先,地方政府需要创新对随迁子女的教育管理方式,改善将随迁子女纳入薄弱公办学校的境

遇。近年来广泛采用的积分入学是一种导向机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相对公平、操作更加规范,但积分标准的设立则需要因地制宜。其次,需要设置一些激励机制调动公办学校老师的积极性,使其能全面了解随迁子女实际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有针对性的学习活动;并且需要对随迁子女的兴趣有一定认识,进而有针对性地指导而非盲目按照性别分工进行教育选择。第三,在一些公办中学可以实行校企合作,并以此作为考核指标给予政策倾斜,目的是为那些初中毕业后计划直接工作的农民工子女提供合理的就业渠道。

注释:

- ① 四星级高中是江苏省评估院对普通高级中学(完全中学)实施的一种最高等级鉴定。

参考文献:

- [1] 邵书龙. 国家、教育分层与农民工子女社会流动: contain 机制下的阶层再生产[J]. 青年研究, 2010(3): 58-69.
- [2] 王毅杰, 高燕. 流动儿童与城市社会融合[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147-150.
- [3] 王刘飞, 王毅杰. 后排男孩: 空间社会学视角下的群体塑造[J]. 青年研究, 2016(1): 66-74.
- [4] 杨东平, 王旗. 北京市农民工子女初中后教育研究[J]. 北京社会科学, 2009(1): 49-54.
- [5] 宋映泉, 曾育彪, 张林秀. 打工子弟学校学生“初中后”流向哪里? ——基于北京市 1866 名流动儿童长期跟踪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M]//杨东平. 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196.
- [6] 刘精明. 教育选择方式及其后果[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4(1): 64-71.
- [7] Turner Ralph H. Sponsored and Contest Mobility and School System.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60, 25(6): 855.
- [8] 赛缪尔·鲍尔斯. 不平等的教育和社会分工的再生产[M]//张人杰. 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180-198.
- [9] Bourdieu P. Cultural Reproduc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M]//Richard Brown. Power and Ideology in Educ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487-511.
- [10] 保罗·威利斯. 学做工: 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M]. 秘舒, 凌旻华,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 151-183.
- [11] 张绘. 我国城市流动儿童初中后教育意愿及其政策含

- 义[J]. 教育学报, 2013(1):111-120.
- [12] 王进,汪宁宁. 教育选择:理性还是文化——基于广州市的实证调查[J]. 社会学研究, 2013(3):76-100.
- [13] 刘玉照,苏亮. 社会转型与中国产业工人的技能培养体系[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1): 25-32.
- [14] 李煜. 制度变迁与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中国城市子女的教育获得(1966—2003)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6(4): 97-109.
- [15] 吴愈晓. 教育分流体制与中国的教育分层(1978—2008) [J]. 社会学研究, 2013(4): 179-202.
- [16] 高明华. 父母期望的自证预言效应——农民工子女研究 [J]. 社会, 2012(4): 138-163.
- [17] Mickelson R A. The Attitude-achievement Paradox Among Black Adolescents [J].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990, 63 (1). :44-61.
- [18] 熊易寒. 城市化的孩子:农民工子女的身份生产与政治社会化[M].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0:80-104.
- [19] Swilder Ann. Culture in Action: Symbols and Strategies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6, 51(2):273-286.
- [20] 唐俊超. 输在起跑线——再议中国社会的教育不平等(1978—2008) [J]. 社会学研究, 2015(3): 123-145.
- [21] 史秋霞. 农民工子女初中毕业的流向研究——以南京市某公办学校初中毕业班为例[J].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3):88-95.
- [22] 王刘飞,葛茹. 职业学校与农民工随迁子女阶层再生产 [J].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4): 122-128.

责任编辑:夏莹

(Email: silvermania@qq.com)

Research on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s Choice of Continued Education after Graduating from Junior Middle Schools

WANG Liufei, WANG Yijie

(School of Sociology,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1100)

Abstract: A survey of a public school for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finds that these children have low expectations for their future and most of them are enrolled in vocational schools eventually when they graduate from the junior middle school; only a small percentage continue to study at high schools. This choice is a result built up by several bodies: first of all, the state "double-track system" gives vocational school and high school different implications; second, short of economic resources and knowledge storage, the migrant workers can hardly exercise effective supervision and offer proper help even though they have a higher educational expectation to their children; third, education authorities are only concerned about the children's placement in a school rather than their further education, which leads to school's "exclusive education" (in consideration of their status of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instead of "inclusive education". These mechanisms jointly affect the children. They choose vocational schools, and they also rationalize their choice. Therefore,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children's low education expectations, both the students' individual "self choice" and the "structural choice" from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should be considered.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educational choice; double-track system; children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educational equality